

職業讀書人劉明清

的全民閱讀理想



辦公室裡的書籍琳琅滿目。 王頌攝

在第19個「世界讀書日」到來之際，24小時不打烊的三聯韜奮書店正式掛牌開業。「希望你們把24小時不打烊書店打造成為城市的精神地標，讓不眠燈光陪護守夜讀者潛心前行。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寫給該書店全體員工的回信中說。

自中共十六大以來延續至今的全民閱讀正悄然融入民眾的生活。然而在中央編譯出版社總編輯、北京市政協委員劉明清看來，中國雖是圖書出版大國卻並非出版強國，由政府發起倡議、更多依靠民間力量設立「全民閱讀公益基金」，也許是真正實現全民閱讀的可行之路。在今年北京「兩會」前，他聯合新聞出版界政協委員，提交了《關於設立北京全民閱讀公益基金的提案》。

■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、王頌，實習記者 馬玉潔

危機「讀屏時代」

當「讀屏時代」到來，數字閱讀、淺閱讀蔚然成風，傳統出版業和實體書店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。但作為在圖書出版界耕耘三十年的資深出版人，劉明清對傳統出版業的前景「倒沒那麼悲觀」。

「在美國，電子書佔近一半市場份額，中國還沒達到。數字出版這個領域還沒有形成穩定持續的贏利模式。」劉明清認為，出版業仍主要靠傳統出版物。但他也坦言，已經感受到公眾閱讀習慣改變帶來的危機感。

「人的成長史其實也是閱讀史」

對於劉明清來說，閱讀紙質書是個人知識水平和修養的提升過程。「資訊可以通過讀屏來獲取，但思考性閱讀、研究型閱讀、深入性閱讀是一定要讀紙質書的。」

劉明清說：「一個人的成長史，其實也是他的閱讀史。一個時代的精神建設，讀書是最根本的基礎，真正思想性的閱讀非常重要。」

商業模式的轉變的確使實體書店面臨電商的強烈衝擊，但實體書店不僅是賣書的地方，也是城市的文化風景。劉明清認為：「一個城市如果沒有特色書店，或者沒有很好的閱讀空間，往往會被大家視為『文化沙漠』。」



劉明清（左二）在第二十屆圖書博覽會上。

「政府不能代替社會做事」

調查顯示，2013年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為4.77本。而北歐國家國民每年讀書24本左右，幾乎是中國的6倍，美國人年均閱讀7本書，韓國人均11本，日本、法國人均則是8.4本左右。這些數據使中國作為文化大國的形象黯然失色。

但劉明清認為政府還是做了大量工作推動全民閱讀的。「今年克強總理把全民閱讀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，已經有全國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建議把全民閱讀納入立法計劃。北京正在申辦世界閱讀之都，像深圳讀書月、北京閱讀季、上海書展等活動政府也在推動。」

民間發起 政府推動

然而具體到實踐上，他表示「政府不能代替社會來做事」，北京全民閱讀公益基金提案的提出也基於此。「我們提倡的基金，政府可以推動，但必須是民間發起。」

籲設「北京文化獎」

中央編譯出版社以「讓中國了解世界，讓世界了解中國」為使命。然而劉明清表示，中國人文學術思想的輸出還在起步階段，完全圖解式、宣傳式的傳播形式也無法進入西方主流書店等大眾閱讀領域。

今年3月，作為北京市政府特邀建議人的劉明清提出設立「北京文化獎」，獎勵在世界範圍內出版或發表的、以北京文化為內容的優秀論著。他說：「北京現在沒有一個國際性的文化大獎，老舍獎、魯迅文學獎等都是獎『自己人』，沒有針對外國人、海外華人及港澳同胞文化方面的獎勵。」

「職業讀書人」願做「促變分子」

作為資深的出版人、發行人，劉明清主持過《大國崛起》、《于丹〈莊子〉心得》等多部暢銷書的市場運作；他也自稱「職業讀書人」，人生和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閱讀；他同時更是一個「願意表達的人」，熱愛寫作。

劉明清認為，鼓勵民間閱讀會，培訓「領讀者」，請專家學者推薦有價值的書目，表彰閱讀的公共推廣人、辦讀書版的媒體、社區民營特色書店等，是公益閱讀基金的主要作用。

冀「讀書券」遏腐敗

在劉明清看來，閱讀是兼具公共性與私人性的行為，既關乎整體國民素質和道德水平的提升，同時也是個人的事情。「如果誇大公性，一味強調政府的推動，反而會挫傷公眾積極性。」他說，「人的素質需在潛移默化中改變，而不能用公共性壓倒私人性。」

對於全國範圍內開展的「農家書屋」工程，劉明清擔憂的是政府包辦採購容易滋生腐敗。從經濟學家弗里德曼「教育券」的構想出發，劉明清提出了「讀書券」的建議。「獎勵企業不如獎勵消費者。如果政府把權力交給農民，農民用貨幣『選票』投向他們愛讀的書，出版機構也不必整天想着向有關機關『公關』了。」

「北京不僅是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，北京還代表了中國。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，都能在北京得到集中體現。」因此，設立一項「北京文化獎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。劉明清透露，目前該建議已收到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的積極回應。



中央編譯出版社總編輯、北京市政協委員劉明清。

他表示，在目前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下，他非常願意做一個「促變分子」，「促中國變，越變越文明，越變越進步，越變越開放。」

而推動全民閱讀、促進文化傳播無疑是他着手「促變」的重要實踐。

楊正江 文化苦行僧 寂寞麻山行



楊正江憑借一輛摩托車行走麻山，尋找苗族歌師東郎。

貴州傳真

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訊（記者路曉寧）

2012年，隨着苗族英雄史詩《亞魯王》（第一部）漢、苗文本問世，苗族無史詩的歷史就此結束，這也成就了史詩最初發現者和翻譯整理者、貴州省第十一屆政協委員、貴州省紫雲縣文廣局副局長楊正江。他說：「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文化人，一個少數民族政協委員，我將致力於傳達少數民族同胞最真實的聲音和訴求！」

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在《亞魯王》的序言中這樣評價楊正江：「他最早發現麻山地區的《亞魯王》，最先認識到它非凡的價值，並一直在田野裡千辛萬苦，甚至形影相吊，默默工作着。」時至今日，能夠通曉西部苗語，又能以拼音式苗文筆錄並譯成漢文的人，仍然只有這位年輕的苗族小伙子。

史詩創造了他生命的奇跡

貴州西部苗族聚居的麻山地區，是個「一川碎石大如斗」的喀斯特王國，山高谷深，交通不便，幾乎與世隔絕，經濟極度落後。1983年，楊正江出生在麻山邊緣一個普通苗族村寨。14歲時，楊正江迷上了寫作，卻因

「太過專注而精神崩潰，差點成了瘋子」。家人按照當地習俗，從山裡請來東郎（歌師）唱誦苗族古歌。不可思議的是，聽着晦澀難懂的歌詞，他的病竟逐漸好轉。直至13年後，楊正江才知道，當時那個神秘的聲音，就是專門吟唱自己民族祖先的《亞魯王》。

尋訪「神秘的聲音」

2003年，楊正江進入貴州民族學院（現為貴州民族大學）學習少數民族語言文學。為尋訪「神秘的聲音」，他利用每個假期進行田野調查，帶上餅乾和水，騎着家裡的摩托車，走訪深山村寨，找尋會唱古歌的東郎。

東郎以及古歌曾一度因為其「封建迷信」被打倒，因此當地群眾對這個年輕人抱有強烈的警惕心，甚至矢口否認會唱古歌。然而倔強的楊正江最終還是被東郎們所接納，他拜師學藝，觀摩和聆聽，學習唱誦亞魯王。

由於苗族沒有自己的文字，楊正江只能採取拼音標注的形式呈現史詩的原始風貌。由於麻山方言苗語的諸多詞語無法與漢語一一對應，一些東郎雖能唱誦史詩，但並不理解有些部分的內涵，這給他翻譯史詩帶來極大困難。

史詩問世 世人矚目

2010年，《亞魯王》被列入文化部第三批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文學項目類別，並被認定是繼藏族史詩《格薩爾王傳》、蒙古族史詩《江格爾》和柯爾克孜族史詩《瑪納斯》之外，又一部民族長篇英雄史詩。楊正江也被授予「中國民間文化守望者」獎盃。

目前，《亞魯王》第二部的採集工作已經展開。楊正江透露，亞魯王工作組還將整理亞魯王的家族傳承譜系，力圖全面「破譯」這位苗族先祖對苗族文化的影響。



楊正江（右）在京領取「中國民間文化守望者」獎盃。 貴州傳真

「做講真話的委員」

楊正江和他的《亞魯王》研究團隊常年行走在麻山腹地的苗族村寨，深知民風民情民意。今年貴州省「兩會」上，楊正江提交了關於基層民族幹部選拔和基層文化館建設的提案。

楊正江發現，許多苗族幹部雖為少數民族身份，但已完全漢化，沒有民族生活經驗也缺少民族情感。「一些人連苗話都不會說，加上不從民族利益的角度對百姓進行引導，容易引起矛盾。」

「民族幹部的素質如何，會直接影響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工作。」楊正江呼籲，政府應加大對民族地區教育投入，培養更多「原汁原味」的少數民族幹部。

「我國的非遺保護工作，根本還是由基層文化館在做。」楊正江說，目前不少文化館引進的大多是歌舞表演人才，缺乏專業知識，不能深入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，導致普查工作舉步維艱。

他建議，基層文化館應該創新招聘模式，第一線必須配備具有民族學、人文學基礎的民族文化專業畢業生。

作為一名80後政協委員，楊正江說，「政協委員肩負着參政議政的職責，反映社情民意，對政府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，既是政協委員的權利，也是義務。我要做講真話的委員，不做拍馬屁的委員。」

一生與亞魯王文化網綁 冀女承父志



紫雲縣《亞魯王》研究團隊。前排（中）為楊正江。

貴州傳真

面對一些文化科研院所拋出的「橄欖枝」，楊正江說：「我這一生要和亞魯王文化網綁，任何事情都不能將我們分離。」

「傳承亞魯王文化的東郎們還能固守多久我們並不知道，老東郎逐步逝去，年輕人又不喜歡，亞魯王面臨後繼無人的尷尬。我們只能盡量走快一點，再快一點。」楊正江表示會盡力將遺產用文本的方式流傳下去。

《亞魯王》第二部、第三部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加繁複和艱難。楊正江說：「如果可以，我也要讓自己的女兒從事《亞魯王》搜集整理工作。我的女兒如今才6歲，但我一直要求我母親教她苗語。」